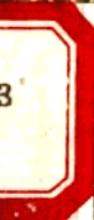


華僑論文集

(第三輯)

廣東華僑歷史學會



目 录

- 论华侨爱国主义（代序）……………廖 钱（1）
从辛亥革命看华侨的爱国精神……………杨万秀（18）
华侨与祖国、居住国的建设……………苏 南（38）
东南亚华侨与中国革命……………钟珍维 丁身尊（87）
新马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卓越贡献……………余思伟（112）
辛亥革命中的美洲致公堂……………钟荣炽（136）
新会华侨与辛亥革命……………陈占标（151）
墨西哥华侨与中墨文化交流……………金应熙（162）
星马华侨的抗日救亡话剧运动……………孙 瑞（171）
华侨、港澳妇女支持祖国抗战……………官丽珍（187）
爱国华侨的反袁斗争……………郭景荣（193）

- 华侨对广东光复和反袁斗争的贡献……黄庆云（228）
- 伟大的华侨爱国者廖仲恺何香凝……廖 钱（250）
-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彭泽民……………关 卫（258）
- 爱国华侨陈宜禧传略……………莫秀萍（269）
- 菲律宾怡朗华侨的救亡协会… 高天雄 吴国源（278）
- 编后话……………（288）

论华侨爱国主义（代序）

廖 钱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①

一、历史的课题、现实的课题

中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富于浑厚民族感情和独特文化光彩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是民族的精英所在。鲁迅曾有过精辟的论证，他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②鲁迅还说过：“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人们的爱国主义往往也从爱护故乡方面表现出来，发展起来的。华侨爱国主义的表现和发展也正是如此。

华侨在爱故乡的朴素感情的本能下焕发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爱国主义的组成部份，同时它又是中国人民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所影响所决定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所撰写的《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一文（1981年3月19日）中说：“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来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产生，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又反过来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以重大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战斗精神和英勇豪迈的爱国

事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动人心魄的伟大史诗，是世界史上伟大的奇观。”华侨爱国主义也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动人心魄的伟大史诗，是世界上伟大奇观的一部份。它以中华民族中一朵民族之魂的光艳夺目的奇葩，映照着中国历史的古今，彪炳于五洲四海。

历史上华侨爱国主义的发扬和其他事物一样总不是顺畅地走着笔直的道路，往往会受到压抑和桎梏；特别明清两朝的闭关自守的那些年代，华侨作为中华民族在海外的移民却不被承认的时候，华侨的爱国心，华侨爱国愿望和精神受到极大的压制，挫伤和摧残。如明朝洪武年间的闭关锁国，严厉实行海禁。“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③，就是说任何人那怕是抱着一块木板浮海而去或说是乘小船出海也是不允许的。片板寸板或小船本是不能漂洋过海的，这只是说明苛律之严罢了。清初承袭了明代的海禁，《大清律》第225条规定“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或移外海洋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处斩立决”。清朝中期的乾隆时代，华侨被当为“天朝弃民”、“化外之民”，遭受人家的迫害、宰杀全然不管的，不加保护的，回国来还要受充军、杀头。这些顽固的、昏庸的封建头子们，既不承认华侨、保护华侨，更无视华侨的爱国愿望，是不言而喻的。“十年浩劫”的年代，林彪、“四人帮”、江青、康生一伙继承封建的衣钵，实行闭关和民族虚无主义政策，也同样对广大海外华侨实行不承认主义，割断“海外关系”，使华侨爱国的愿望和精神又一次遭受了极大的压制，挫伤和摧残。

华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又是当前中华民族走在新的复兴的“振兴中华”的时刻，东风浩荡，华侨爱国主义精神正焕发出其新时代的青春。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新认识华侨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华侨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时代所赋予我们的责任。胡耀邦同志曾指出：要保护和发扬侨胞爱祖国爱故乡的热忱，那个地方挫伤

侨胞的爱国爱乡热情都是错误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

认识和发扬华侨爱国主义精神，它既是历史的课题，又是现实的课题。

二、早期的华侨爱国主义

历史从来都是最公正的评论者和鉴别者。我们就看一看华侨爱国主义的历史前进的脚步吧！

一部华侨历史可以上溯到很古老的年代。大概自秦汉以还，我国的先民就已经和邻近的国家发生旅行和开展交往了。唐宋以后，出国的现象更是逐步的频繁和扩大。历史上唐代是中华民族最有朝气的一个时代，也是文化光辉灿烂的时代。她和国外民族国家之间的来往也是十分频繁的。历史上有所谓“住唐”、“住番”之说。“住番”，指的是中国人“流寓”“流徙”到外国去的一种自然移民的称呼。那时流寓国外的中国人自称为“唐人”，返回祖国叫做“回唐山”。“唐山”正作为国家的观念而在华侨中成为神圣的、富有民族自尊心的、蕴育着神圣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意念。这也表达远适异国的古代移民怀念祖国的一种不可泯灭的传统的民族意识。

原始的华侨爱国观念可以说还是一个朴素的乡土观念罢了。古代出国的华侨大都是由于内陆和海上交通的往返与商业贸易中而形成的移民。在他们的原始的思想意识中“尚多不脱故乡庐墓思想”，至于国家的政治概念则是很模糊的。华侨的出国，到了十七世纪以来的近三百年间，其中有相当一部份是战争和其他的政治原因，或者因朝代的更迭不服新王朝统治的臣民，逃移国外，象明清交替之际，郑成功的部属因失败移居外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失败移居国外的……。这些出国的因素往往在华侨中形成了“国家兴亡”的意识，成为他们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中心。明亡以后的一段历史，鲁迅说了这个问题，他说：“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

外，志在恢复的人。”④指的该是“国家兴亡”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爱国救国意识。更其重要的，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史上的华侨出国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的时候，华侨对“国家兴亡”的爱国主义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这一段期间，近代中国急剧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华侨出国性质也在急剧转变，成为人口大量外流的悲惨移民。

先剖视一下这场悲惨移民的史实：

近代史的阶梯上，华侨大量出国乃因一方面祖国严重地遭受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商品倾销”和“船坚炮利”的冲击，野蛮的掠夺；另一方面垂死的封建主义者却更加贪婪地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原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迅速走向崩溃。农村破产，城市萧条，人民无以为活，特别是东南沿海无法找到活路的农民，只好漂洋过海谋生。正如恩格斯所论述的：

“对华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国家的闭关自守已不可能……于是旧有小农经济制度也随之而日益瓦解（在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中，农家自己制造必要的工业品），同时，可以安插比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并随之而崩坏，千百万人将无事可做，将不得不移往国外”。⑤这就是我国当时移民的原因和实质。这里充满着悲剧的血和泪，也充满着斗争的火与光。

在这一个历史关头的华侨纷纷出国现象和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向东方的入侵，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发生的。大规模的“猪仔”移民高潮和西方殖民者原始资本积累的膨胀，如美洲新大陆发现后的垦荒，铁路的加紧修筑，东南亚沦为殖民地之后的这些地区的工厂的迅速建立，矿山的大规模开掘，种植园垦殖的扩大……是相伴而来的。当西方资本家腰缠万贯，金元象源源不竭的川流，哗啦啦流入他们腰包的时候，成千成万华侨正是在殖民主义者皮鞭之下，悲惨地过着奴隶生活。他们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猪仔”移民。列宁在《资本主义和工人移

民》一文中指出的：“毫无疑问，只有极端的贫困才迫使人民离开祖国，资本家正在肆无忌惮地剥削移民工人”^⑥。这是当时广大华侨所处的惨痛景况。史载，在鸦片战争前夕，分布于南洋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华侨至少有一百余万人。尔后由于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之后，帝国主义更以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人民，如1860年英法联军与清政府签订的《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命令废除海禁让殖民主义者的魔手肆无忌惮地伸进来，1866年英法又与清政府签订招工章程条约，允许英法籍人，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还有和美国签订类似的条约……都成了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掠夺贩卖中国劳动力的护身符。强制人口输出的结果，我国特别是南方沿海省区便成了为他们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商品市场。人口急剧外流，加上其他原因出国的，到了十九世纪的中下期的清末侨居在东南亚、南北美洲的华侨约有六、七百万人。其中在东南亚的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

悲惨的“猪仔”移民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中间经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达到了高潮。如史籍所载十九世纪末，汕头“每岁附轮往外洋者四、五万”，又据“关册记载，仅厦门一地，1905年前后，每年出国人数就达十万人左右”^⑦。又如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朝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给外务部报告中说：“每年从香港、厦门、汕头、海口等地到达新加坡的华人约十余万人，其中百分之七十是猪仔”^⑧。到美洲等地的华工，如运往秘鲁、古巴、智利、檀香山的契约华工，在1845年至1874年的三十余年内有数字可查的达四、五十万人……。猪仔移民，由于华侨的不断反抗和世界舆论的压力，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才宣告结束。

“猪仔”移民的时代由于祖国处于危难深重不可终日的时刻，广大的海外华侨也因寄人篱下，日益走向困厄。他们正当权利和利益得不到任何保障，成为无依无靠的“海外孤儿”。

国家民族和她的海外华侨都在穷途末路的两股平行线上挣

扎着。人民要摆脱奴隶的困境，国家民族要寻找挽救沉沦的出路，历史的条件和现实的因素都构成，只有冀求国家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和民主富强，才是唯一出路。并在这一冀求和强烈愿望之下由此而产生了近代的炽烈的爱国情怀。华侨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血肉相连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就产生了一种从政治上要求“救国”、“革命”的新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新的革命精神。这就从原始的，朴素的，从爱故乡升华起来、发展起来的成为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的能保护海外华侨的爱国主义。这一爱国主义是以“觉醒”（觉悟）为主要境界的。

政治上要求出路的爱国主义，以至于发展成为当今拥护新的伟大祖国的，有充分自尊心、自豪感和充满信心的对祖国有深情笃爱的新的爱国主义。这是华侨爱国主义历史发展的明显状况。

三、近代华侨爱国主义的高潮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⑨。这是中国资本主义革命思潮的兴起。这一思潮的兴起是以民族觉醒的以反清革命为标志的。刘大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一文中指出：“武昌起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民主共和国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它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的创举，也是整个东方文明史上的创举”。在此，华侨爱国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和掀起新高潮，这也是一个创举。这些创举都应该归功于孙中山。

孙中山和他的革命派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走革命道路的伟大爱国主义行动和他所建立的东方古老大国土地上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制民国，是一个卓越功勋。

近代苦难的中国，人们思想认识的发展，经历过一个由朦

胧到觉醒的飞跃。朦胧的思想阶段，从实质来说，爱国只要求一个好皇帝罢了。以为有个好皇帝就可救国救民。这还是一种“皇权思想”。如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义和团以拒外人为目的“扶清灭洋”运动，“戊戌政变”希望以和平方式振兴国脉的维新运动。这些爱国运动，虽然曾在中国历史的死水潭里激起过壮丽的波纹，但毕竟还是接受了君权的旧的历史局限或摆脱不了“君主立宪”的藩篱。

“百日维新”的爱国志士虽然也提出过有民主主义内容的“冲决网罗”的壮烈口号，宣传“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以泄万民之恨”（谭嗣同的《仁学》），但是“改良、变法”或是“君主立宪”派，实质上还是“忠君”的爱国思想。他们想的还是寄希望于有一个好皇帝以解决软弱无能的国家。他们只是拥清改良而已；况且他们的幻想也很快地被昏庸、阴险、残暴的卖国主义者慈禧太后镇压下去了。戊戌政变人士中的六君子被送上了断头台，政变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国外。

这些保皇的思潮后来还在华侨社会中扩散着，并且广泛地发展保皇组织。为什么“保皇”的势力能在华侨社会中迅速发展？毫无疑问，处在革命前夜的华侨社会的“风气未开，人心锢塞”^⑩的朦胧的爱国主义思想也还是仅仅停留在要求有一个好皇帝罢了；何况康梁又在华侨社会中提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有极大欺骗性、迷惑性和麻醉性的口号，混淆视听所致。但，被迷惑和麻醉的并不是华侨爱国主义的本质所在。因此，孙中山在日本、美洲、南洋各地华侨社会奔走革命，针锋相对地和“保皇势力”展开的一场尖锐、激烈的舆论斗争的时候，孙中山亲撰《敬告同乡书》严正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

火，”。他撕下了保皇派、改良派的伪装，并号召人们“划清界线”。从而在华侨社会中革命政党迅速发展，保皇的思潮和它的势力一个一个地被粉碎。

这一场斗争是华侨社会的爱国主义思想发展中，先进与落后，保守与革命二种爱国主义思潮斗争中的波澜。事实证明，先进的总是战胜落后的，新生的总是战胜腐朽的。广大华侨接受了孙中山爱国革命的思想主张，成为华侨社会的思想主张之后，华侨爱国思想得到很大的启蒙。这是孙中山和他的革命派章炳麟、邹容、蔡元培等等和广大华侨在这场斗争中作出的杰出的贡献。

祖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爱国主义思想从“朦胧”到“觉醒”的质的飞跃，奠定了辛亥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想基础可以从孙中山思想的发展中得到更清楚的说明。

孙中山从小接受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小时候就是一个对封建迷信的叛逆者。他又是一个华侨。他少年（1878年，清光绪四年，十二岁）出国，远航檀香山。当他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时代气息，使得他的思想中萌发着原始的，以觉醒为内容的爱国思想。他说：“始见轮舟之奇，沦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①。他目击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夏威夷荼毒当地土著居民和华侨的暴行，而远怀祖国的孙中山便感慨地说：“那改良祖国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而后快”^②。后来这一思想成了他革新旧世界的萌芽。往后又接触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希望中国能够达到民主自由的新社会。后来又在1883—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条约更激发了他“改良祖国”的政治抱负，同时他考察和分析中国的落后的国情之后，更产生了他早期的强烈的改革政治以图国家富强的主张。这主张后来充分反映在他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所提出的：“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全固兵强，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而

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这正是他改良的蓝图。《上李鸿章书》表明孙中山的早期民主革命思想还停留在“改良主义”的圈子里。

事实的教训是最有力的鞭策，使他跳出不切实际的改良幻想的圈子。当他这一上书遭到李鸿章拒绝之后，他随即认为中国非走武装暴动的革命道路是不能救中国的。于是使得他早期萌发的反清革命意识的因素得以前进而没有在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打转。中日甲午战争的腥烟血雨浓重地弥漫着整个中国，也激发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高涨，也激发着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国家前途和命运，革命思潮在他脑海里掀起翻腾的怒浪。当时急于擎起民主革命大旗，站在时代前列的，正是摆脱了改良主义影响的孙中山。爱国、救国、革命这三者，结下了“姻缘”，发展成为真正的救国救民的爱国道路。这是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飞跃，后来以他的自己的革命实践，证实了他的以革命实质为内容的爱国思想的发展。

在华侨社会中，美洲、南洋各地华侨在当时以“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激荡下，也正如春风吹绽了含苞怒放的鲜花一样，从兴中会到同盟会，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些革命政党都迅速的得到广大华侨普遍的拥护，参加和支持。接着1895年广州起义的失败与1900年发动了惠州起义的第二次武装斗争之后，孙中山在日本、越南、檀香山、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地发展了兴中会。当在1894年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的章程中就曾提出“联络中外华人，创兴中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表明了联合海外华侨救国的意志和途径。兴中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实际上成了华侨投奔革命的誓言。后来在1905年8月孙中山又在日本创立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进一步提出“建

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以后又发展为“实行三民主义”的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纲。在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时代，世界各地爱国华侨迅速团结在孙中山的旗帜之下。“同盟会”遍及世界各地。加入“同盟会”的非常踊跃，有的全家大小悉加入会。

广大华侨社会成了辛亥革命运动中积蓄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斗争的基地了。接连不断地在南方数省革命的暴力行动，差不多都是在侨居地酝酿成熟和组织起义的。像1907年到1908年一年之间在粤、桂、滇三省边界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大都是在河内策动的。著名的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是在新加坡槟城由孙中山、黄兴等人组织和策动的。三月廿九日之役的起义是辛亥革命胜利的前奏，从而促使了同年的十月推倒满清政府的武昌起义的全面胜利，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

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包括华侨爱国主义，无不充分表现了它的进步性、革命性和无坚不摧的无比强大力量。

四、华侨爱国主义的本质和特点

根据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它的革命运动就是具备既反封又反帝的特点，因此近代华侨爱国主义是反帝反封建的产物。它的内容已是具备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反封建的革命又是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卖国主义，要求国家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博爱，谋求富强为其鲜明目标的。虽然孙中山没有直接提出反帝的口号，但他彻底推翻“洋人的朝廷”满清政府的行动就是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民族危机深重是激起中国人民和华侨从而产生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爱国精神的基本因素。

有压迫就有斗争。华侨的革命性也可以说是迫出来的。它是一个有无比强大生命力的和无限威力的一种革命精神，又是

一个无比强固的热爱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优美的道德规范与国家民族的高尚情操和胸怀豁达的真纯的“爱”的表现。华侨爱国主义的表现也是民族精英的表现。所以，他能表达出如此英勇卓绝的革命行动和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如温生才，南洋霹雳工人，刺杀清将军孚琦，被捕入狱，清廷审问他为何要刺杀，温慷慨激昂地说：“满清无道，昭外侮，皆此辈官吏为厉之阶耳。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借此以为天下先，此举纯为救国起见，非与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使”^⑬。旧金山工人邝佑治刺杀赴美考察海军的清贝勒，筹办海军事务大臣载询，未果，被美警逮捕入狱，当审问时邝慨慷陈词：“我欲救国，虽死亦所不辞，中国必将为民主国，今我所谋不成，但尚有多人如我者欲行之事，倘我能达到目的，坐电椅而死，亦瞑目矣，我此次行刺，早已预备，别无人知”^⑭。“三·二九”殉难的华侨烈士中，如新加坡工人李文楷，当他听到起义时兴奋地说：“吾致志祖国之时至矣”^⑮，河内华侨罗联在起义中被捕，就义时高呼：“中国非革命无以救亡”，在狱中还嘱咐其族弟望“能继吾志”；缅甸华侨李雁南起义时中弹被捕，就义时对警兵说：“请用枪从口击下”，说完张口饮弹而死；大霹雳华侨教士李炳辉回国参加起义时适逢母亲生日，催他回家探望，他复信说重任在身不能回家，附诗一首：“回首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堕地时，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丝”^⑯。华侨对祖国的生死存亡和个人荣辱紧密地息息相关，所以，忧时危，赴国难而毫无吝色，为祖国革命献身的时候，能抛头颅，洒热血而不反顾。因此华侨革命党人的革命行动和那种慷慨就义的精神，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

华侨爱国主义的本质，由于是祖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绵延不断的固有的勤劳和智慧的，酷爱和平与自由的民族性所凝成；又由于近代祖国受尽列强侵凌欺侮和华侨长期以来所身受的忧患所积聚的“爱与恨”而交积起来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力

量和革命力量。这就是华侨的爱国主义的实质所在。如孙中山奔走革命期间，他的哥哥孙眉，第一个赞同“兴中会”而自愿拨出一部分财产为助，华侨邓荫南和孙中山“订生死交而倾家以助”。辛亥革命时期孙眉更“以每头六、七元价钱售其牛牲一部以充军饷”，邓荫南“变卖其商店和农场”所得支援革命。陈嘉庚在新加坡积极为革命军筹办捐献，司徒美堂在美洲竭力资助孙中山应革命军饷之急。在美国有“无以栖身而借债捐助的”。张榕轩（煜南）、张耀轩（鸿商）兄弟爱国思想的表现还有一个插曲：有一次张耀轩准备到新加坡办理商务，德国轮船竟规定不准华人购买官舱票，这事激发了张氏的民族自尊心，张氏兄弟和张弱士三人遂发愤自办华轮亦规定华船“一律不给德国佬买票”，给予报复。

1907—1908年粤、桂、滇三省六次起义，其费用近二十万元，一半筹自南洋各地华侨。^⑦在筹备起义时，孙中山命新加坡华侨资本家陈楚楠等筹款接济，楚楠恒踊跃输将，惟恐不力^⑧。西贡巨商曾锡周、马培生、李卓峰等捐资数万^⑨。新加坡资本家肖竹漪，不仅为革命来往奔走，“且尽贷其田产，得资数千金，供运动经费”^⑩。防城、河口、镇南关诸役失败后，起义战士数百名退走海防，饷食无着，李卓峰“财力亦竭，惟仍设法向银行借款二万济之”。孙中山以卓峰“屡次输将，曾与回债票数十万”，卓峰不望偿还，将回债票“尽付一炬”^⑪。资本家林受之因革命“毁家财产数十万，致成群儿女无法受教育，沦为佣工”^⑫。

1911年黄花岗起义，华侨资本家郑螺生变卖福建江苏铁路股票，李水源则变卖打铁矿股，以助军饷^⑬。芙蓉资本家谭德栋尽倾其店中所值五千元以供起义^⑭。捐输革命最令人感动的，如越南堤岸华侨小贩黄景南，以卖豆芽为生，为了支援革命，“每月恒以所得投入扑满中，贮为捐助革命之需”^⑮，最后乃将自己一生积蓄数千元钱全部捐献为革命经费。越南挑水

工人关唐，每担水只值一文钱，亦倾一生积蓄三千余元，悉数捐献^⑩。这些无私的捐输的表现，也就是华侨爱国主义实质的反映。

中国近代史上华侨杰出的人物，有伟大的爱国者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陈嘉庚、司徒美堂；有著名的爱国者黄兴、章炳麟、蔡元培、宋教仁、史坚如、郑士良、杨衢云、容閎、严复、谢缵泰、苏曼殊……等；还有许多象孙眉、邓荫南、关唐、黄景南、陈楚楠、李卓峰、肖竹漪、林受之、郑螺生、张榕轩、张耀轩……等等慷慨捐输的爱国者；特别还有许多象温生才、邝佐治、李文楷、罗联、李雁南、李炳辉……等等舍生取义为国捐躯的烈士和许许多多参加革命在枪林弹雨中献出宝贵生命的英勇的爱国者。

从华侨爱国主义的实质具体地剖析来看，还是基于要求国家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近代华侨发扬爱国主义是从发扬民主主义这一根本精神为核心，同时又是发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坚毅、慷慨、直率、诚信，富于正义感以及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的，这些本能的优良传统。因此，从匹夫之勇进到为国为民的革命行动，这就成为要求破坏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华侨爱国主义已表现其进步性、革命性，因此它的实质又包含一种科学精神的涵义。“民主和科学”差不多是近代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互相连结、互相促进的，一种社会现象的二个链环。事实正是如此。历史上许多科学的发明发展的途径都是和反封建、反奴役、反控制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科学是事物的真理。要民主必须要科学来为它服务，要科学必须要民主来为它作保障。因此，华侨爱国主义的民主的另一面就是科学精神。因此华侨爱国主义的本身又必然是具备反对愚昧和奴役，反迫害，为真理而奋斗的民主和科学为其特点的。

科学是不断进步的，不断革新的。爱国主义的思想也正是

跟着民主、科学的时代要求而不断前进和发展的。我国近代史上首先提出反帝、反封建任务的是“五四”运动。它的口号就提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民主和科学是以运动的哲理来作为它的动力的。因此，有民主和科学特点的，要求不断进步的，无疑又是华侨爱国主义发展的主流。由此看来，可以明确地说，华侨爱国主义的本质和它的体现乃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相结合，并在不断前进中发展的。这也正好从孙中山的思想发展得到证明。伟大的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到了晚年全面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就是他追求科学真理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实质的不断进步或说是一大发展。宋庆龄同志指出：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⑩。

从“五四”运动起，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六十多年来，华侨爱国主义正发展了和丰富了它的新内容；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是达到崭新的境界。这里可以这样来论证：广大的华侨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时候，为什么广大的海外华侨欢喜若狂，热泪盈眶；有多少爱国华侨纷纷回国参加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有多少海外华侨青年离别父母奔向新生的祖国；又有多少科学家、知识分子自愿回国把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于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新生的祖国真正达到民主、自由、独立而走向强盛而使广大华侨普遍产生自尊心、自信心，产生光荣感、自豪感；从而产生热爱伟大的新中国的种种具体的表现。

中华民族从此崛起置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使“海外华侨